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三十八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	张邦永(1)
四十年来的仁立公司	朱继圣 凌其峻(20)
三才生煤矿投靠官僚资本的始末	黄明安(45)
天津的洋行与买办	毕鸣岐(60)
我在汉口礼和洋行十五年的见闻	张高级(86)
从日商若林药房到自办民生药房	王仲南(98)
旧上海的大赌窟之一——回力球场	毛啸岑(109)
漫谈黄楚九及其“事业”	平襟亚(129)
豫西旧社会军匪横行的概况	王凌云(140)
河南内乡土皇帝别廷芳	别光典(156)
我所接触的豫北红枪会	王振民(169)
樊钟秀事略	张 钊(175)
我所知道的洪门史实	樊崧甫(185)
司徒美堂与美洲洪门致公堂	司徒丙鹤(204)
包头流氓低层社会的“梁山”	刘映元(231)

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

张邦永

段祺瑞当政的中国政府在 1917 年 8 月 14 日宣布对德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英法两国立即开始招募华工到法国战场上去。它们与段政府商定的华工数目，英国方面是十万人，法国方面是五万人，实际都是招足了的。法国所招募的华工情况我知道的太少，这里只说我亲身经历的英国方面的情况。

—

那时我刚读完清华学校的中等科，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度暑假。9 月初开学时就将升入高等科，高等科四年毕业，就将享受公费留美的权利。但在 8 月 20 日，接到一封在北京消夏的同班同学刘沛章的来信，说他已在北京英国公使馆考取头等华工翻译，即将去威海卫编队；从威海卫坐轮船到法国战场上去；薪水是每月一百二十元，吃的、穿的和往返旅费，都不须自己付钱；并且说，除在战场上能够看见全世界最高的科学成就外，战后还可到欧洲各大城市去游历；又说招考还在进行，问我们愿不愿意应考。我们见信后，不但一些与刘沛章同班的中等科毕业生决定去考，高等科一年级的吴泽湘（1925 年起在外交部工作），和高等科二年级的张保（1940 年在重庆当国民党政府的税务署长，更名张静愚），也都决定去。我当时正感到经济困难，连开学时买书的钱都没有，所以也决定去。同

去的共五人。

到北京英国公使馆后，一个英国人用英语对我们五个人分别问了几句话，就叫我们去检查身体。检查身体只是听听心脏，看看眼睛和生殖器，进行得也很快。此事一完，就宣布我们五人都考上头等翻译，同时给我们每人一张由北京到天津的二等火车票，和一封共同的介绍信，叫我们第二天就起程。天津的英国轮船公司看了介绍信后，立即派一名工人引我们上轮船，当晚就开了船。同船有五、六百名工人，有一个英国人领导。次日午后到山东半岛东北岸边的威海卫时，已有些人在码头上等着，一个人把我们五人领到翻译房，其余一些人则领了工人到帐篷中去。

当时的威海卫，只是一个乡村模样，市中不过一百来栋旧式平房，市外有一座小洋楼，是英国人住的。工人住的大片帐篷都搭在半山坡上；其中夹有五、六栋木房，就是翻译房、办公室和库房所在。电灯电话，都是因陋就简地新安装不久的。统率这一切的人，是英国驻威海卫的领事，名叫马斯(Moss)。

我们进翻译房时，那里已有二十一人。六个是头等翻译，薪水同我们一样，每月一百二十元；四个二等翻译，月薪九十元；十一个三等翻译，月薪六十元。我遇到一个同乡鲁继曾，四川保宁人，杭州之江大学三年级学生。他比我大六岁(二十六岁)，已很会观察事情。他说威海卫的事情办得很快，已经开走了二千多人；青岛方面开走的人还多些。他说英国人在青岛方面招的工人，大都是山东的农民，招的翻译则大都是从上海和汉口两处来的。威海卫方面招的工人山东人占一半，天津来的也占一半，翻译则都是北京和天津的学生。青岛和威海卫两方面的工头大都是英国人，另外招有中国码头工人和教徒，其中也有些铁路上的工头。我说：“据说，招募华工是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合办的，青岛和威海卫大概都有中国政府的代表吧？”鲁说：“没有、没有，你没看见报上说的，段政府对外是宣而不战，对内是战而不宣么？”

第二天，马斯找我们五人去谈话，首先给我们看需要我们签字

的一份中英文对照的合同；条文我记不清楚了，大旨是：(1)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参战，参战是中国人民应尽的义务；(2)头等翻译的薪水每人每月一百二十元，一半由英国政府负责按月汇到签字人家里，一半在法国按月发给签字人另用；本人的衣、食、住、行各项费用物资，概由英国政府免费供给，其等级与英国的尉官相同，但不给委任状也不作战；(3)战事结束后，翻译可到欧洲各大城市去游历，往返途中也可游览，旅费自备，英国政府也将给以可能的便利；(4)翻译须服从英国军官的指挥；(5)合同有效期间三年。

马斯见我对合同没有异议，就叫我签字，签字时我发现只签一份给他，不照例双方各执一份。马斯说，这是中国政府同意的了，合同中的条款有双方政府担保，不必过虑。我也信以为真，当时很满意。马斯又叫我写信回清华学校，多叫些同学来，邮费也不须我付，只把信交给他就行了。

当天下午我领到了三个月的薪水(三百六十元)和秋季的服装。工人和工头也是这样，不过他们服装的质量差些，工人的薪水是每人每月三十二元。工头分三级，每高一级大约多六元，具体数目记不清楚了。

第三天上午，大家穿上新衣去编号。工人和工头的号码都是在铜片上打好了的，临时把铜片卷成一个镯子，用机器扎在他们右手上(直到三年合同期满回到青岛时，才用机器把铜镯卸开取下)。翻译的号码，则是自己到银店里去买一个椭圆形的小银牌子来打数目字，形式好看一点，也必须经常带在右手上，只是不工作时可以自己取下来。从此以后，工人都叫号数，翻译虽叫姓名，但须记住自己的号数(我的号数是四〇八四三)，有事时仍以号数为准。

编号之后，各人都捧着用粉笔写好号码的小石板放在胸前照相；后来把相片贴在自己的薪水本子上。每次发薪时，领款人在薪水单上打手印，发薪水的英国人，则在各人的薪水本子中登记一笔。

第四天就编队。每班十五人，另加一个工头，他左右袖口上都

钉好一条红布带，所以普通叫他“一道”。一班人叫“一篷”，因为这十六个人同住在一个帐篷中，在威海卫是这样，后来在法国战场上也是这样。三篷为一排，有一个“两道”的工头带领。三排为一连，有一个“三道”的工头带领。每营三连，有翻译二人，和英国营长一人，合计四百四十七人。这是在威海卫时的编队。到法国海边的英军华工总部后还要加些英国工头，下文再谈。

编队后，每天早晚各下操一小时，余时可以自由活动。第一次下操回来时，营长到一个华工住的帐篷里，叫一个带有辫子的华工张彦彬去剪辫子，营长的中国话说得很好，而且是北方话。张彦彬说：“谁也不能剪我的辫子，要剪就取消合同，给我船票和车票，我自己回河间县去。”营长说：“大家都没辫子，你一个人带辫子，多难看呀！同我去吧。”同时就伸手拉他。张彦彬推开营长的手，怒目而视地对营长说：“中国人历来都有辫子，怎么会难看？你要动手，就来吧！”张坚决的气概，环观的人都为之瞠目，营长看出那是一个威武不能屈的人，也就搭讪着说：“好、好，以后再讲吧。”我当时就很敬重此人。后来见他不轻言笑，却很乐意替人写家信，不受任何报酬。同他熟习的人说，他原是教书先生，所以叫他“张先生”。我说：“你们也叫我张先生，莫弄混了，只叫他‘先生’好不好？”张在旁听见，对我一笑表示承认。从此“先生”二字就成了他的专称。有人说他的太极拳打得好得很，常常半夜起来光看上身打拳，却不肯教人。

第七天，我们那一营同其他四营，共两千多人，同搭一只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，经日本到加拿大西岸的“梵科瓦”(Vancouver)。登轮后，翻译住的房间和吃的饭食，都远不如轮船上的英国士兵，这是明显地违背了合同。十个翻译同去向英国领队交涉。英国领队名发美尔(Farmer)，是天津某洋行的职员，说一口很好的北方话。他说轮船是从香港来的，已经没有空位，翻译的住房无法改了；伙食可以改为西餐，但须到厨房去吃，不能进餐厅，这是轮船上的规矩。上海来的翻译也说外国轮船确有这种规矩，中国人无论怎样

阔，只能住下层的中国舱，不能住楼上的外国舱，所以我们也就委曲求全了。

轮船在日本的大阪上煤停了三天，没让中国人上岸；到横滨又停三天，仍然禁止中国人上岸。翻译们根据合同向领队交涉，领队答应我们上去玩一天，但要我们保证工人们不提出同样要求；由此我们知道，英国人对于合同是没有诚心遵守的。五个营的二千多人，挤在一条船上，经过十八天之久，没有活动的机会，影响健康很大，害病的和吃不下饭的工人，逐天多起来。到了荒芜的梵科瓦码头后，大家才到山间和海边舒散了三天，把健康恢复过来。

由梵科瓦分乘五列火车，横穿加拿大，走了八天八夜才到哈利法克斯(Halifax)。沿途停车时，不准中国人踏上月台一步，我们始终缩在车厢里。在西段，从车中向窗外望去，只见白雪皑皑的山峰，和在丛树中时隐时现的小溪。加拿大的中部是广阔无边的干枯了的草原，既无人烟，也无房舍(除车站外)。到终点的哈利法克斯，望见了一座美丽的城市，但火车停在轮船边，下火车后，穿过月台就进轮船，根本没看见该市的内容。到法国后，在报上看见，该市因停在码头上的军火轮船的爆炸而完全毁灭时，我们都为那样美丽的城市而深为惋惜。

这只载重两万吨的轮船，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，是由俘获的德国运输舰改装的。船名“鸠丽亚斯”(Julius)，身长一百零八码、其高度，从船舷数上去有十三层。威海卫和青岛两处来的华工约共五千人，只住了一、二两层，其中还夹有操场和戏院。翻译住在顶层，上下乘电梯。

同路航行的还有八只轮船，听说都是万吨左右的，排列在鸠丽亚斯的四周，相距都在四百码以上，那些船上装的什么都看不清楚。商船之外，还有许多军舰和鱼雷艇保护着。向前后左右望去，都看见它们散布到天边的尽头。在行近英国的第七第八两天，听说护航的军舰增加了很多。有人用望远镜看了后说，四而都是舰队，散布到二十余英里之远。

从哈利发克斯出来以后，天天都有很大的风浪。在太平洋中经常看见的光滑如镜的洋面，在大西洋中根本没见过。第五天的风浪特别大，接近鸠丽亚斯的轮船簸动得很险。远处的鱼雷艇，则好像在形似山岳的巨浪中穿进穿出。我们这只大船，则把涌来的巨浪，劈成瀑布似的宽大的水帘，高悬在我们的两侧。

第七天早上选了二十几个眼力特别好的华工分班到顶上去守望，每班四人，了望两小时。选去的华工，都认为担当的是关系全船一万多人的生命的重责，大家都冒着刺骨的雪风，认真负责地了望。第八天一早，船头的两个华工发现一个可疑的“小点子”。船方用望远镜复查后，一面鸣炮告警，一面传语全船各人都捆上救生带，同时轮船也改走“之”字路线。我们看见几只小军舰向出现“小点子”的洋面驶去，放了些深水炸弹，历时两点多钟才解除警报。（防卫虽然这样严密，我们到法国三个月后，听说，这只大轮船还是被德国的潜水艇用鱼雷炸沉了。）

第八天晚间，《鸠丽亚斯》巨轮进入利物浦港，也是与火车平行停泊着，华工下轮后，穿过月台就上火车。人一上齐，就连夜开车，次晨就到英格兰东岸的“福克斯”镇(Folks town)。我们穿过了工厂林立的英格兰中部，但什么也没看见——为防德国飞机轰炸，车上的窗帘闭得很紧。

二

福克斯镇上的大群帐篷，散乱地安设在一列山边的平原上。帐篷间夹着些树木，加以帐篷顶上涂有黄一块绿一块的颜色，天空的敌机一定难于辨认。帐篷很多，大都是长方形（也有少数圆顶的），杂乱地安置在大约三个平方英里的平原上。北边住的是英兵，南边已住了一大批华工。我们一到，就有很多华工来迎接我们，替我们带路，帮我们安设铺位，指示我们领饭领开水和大小便的地方；然后三三两两地坐在地铺上谈起来。据说我们在那里等候小轮过英

伦海峡。由于海峡中时常发现德国潜水艇，小轮时常停驶；有些人已等候三天了。吃的是面包、饼干和各种罐头（翻译多一样黄油），但数量有规定，装不满肚子。尽管这样，当天晚上，许多早到的华工和翻译，还是节省出饼干和罐头，各自招待自己的同乡或朋友。

我们在福克斯镇只住了一夜，就坐小轮过海。下轮后走了两点多钟，就到华工总部所在的骆耶耳(Loyelle)。这是法国东海岸上的一个小村子，华工总部只是村外平地上搭的一些圆顶帐篷，夹着一些长方形的小木房。这与福克斯镇不同，不但没有树木遮掩，而且把几十个帐篷划为一组，四周用铁丝网围着，门口有荷枪实弹的英兵把守。我们那一营恰恰住满一组帐篷，一进去就不准单身出来，也没人来看望我们。

次日整营到大操场去编队，有许多荷枪的英兵随去，也有不少的英国军官和弁目。分排列队后，每班来了一个左臂上带着一条黄色短条的英兵，每排加一个带两条的，每连加一个带三条的。后来华工都叫他们为英国“一道”、英国“两道”、英国“三道”。英国“一道”不但要管中国“一道”，有时还要管中国“三道”，也直接管华工。此外还加了中国大队长（“四道”）和英国大队长(Sergeant Major)各一人，炊事员四人、勤务员六人，又裁缝、皮匠、理发师各一个，连翻译二人，全营合计五百人，即：

工人二十七班，每班十五人	405 人
中、英工头各四十人	80 人
炊事员四人、勤务员六人和翻译二人	12 人
裁缝、皮匠、理发师各一人	3 人
全营合计	500 人

以上这些人，在操场上编队后都算确定了，只有中国大队长后来换了两次。最后换来的冉振海是河北保定人，四十来岁，身强力大，天主教徒，能说一点英文。他原来的职业，我们虽同处将近三年，从没听他说过。他是第一批到骆耶耳的，他说那一批有一百多人，已在骆耶耳受了一个多月的训练。华工总办普登上校(Colonel

Pourton)和会办鲁斯顿上校(Colonel Ruxton)每天轮流给他们讲话。他们那一批人,已经派出来工作,最低是“三道”,一般是大队长。他们的总队长姓姜,外国人叫他约翰,也是华工总部的总队长,月薪一百八十元。我后来听说,普登是在中国生长的,在上海英国工部局搞过多年,四十岁以后调到南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工作,新近由南非洲调来当华工总办。鲁斯顿也是从上海英国工部局来的。1930年他在上海当盐政局税警科的副科长。姜总队长则是上海英国工部局的一个巡捕头。

书归正传,还是说1917年11月间,在骆耶尔编队的事吧。此时营长换为一个英国军官,名李笛亚迪(Lydyart),三十来岁,贵族出身,大学毕业,受过短期的军训。此人很会摆架子,实际却胆小,遇到情势严重时,会立即改变方向。这是后来我们从多次斗争中摸到的他的个性。营长之外,还加了两个副官,其中一人会说很好的上海话,满脸烟容,肯定是一个大瘾客。这三个军官都是英国中央政府委任的,其待遇比四十个没有受到任命的英国弁目高得多。这三个军官每人住一个帐篷,每人有一个勤务员。

李笛亚迪营长在操场编队时,就说要剪“先生”的辫子。旧营长(后来编到别队当副官)当时就把曾在威海卫想剪“先生”发辫的经过告诉了他,并说:“先生”不好惹,且会打拳。李营长说他有办法。当天下午,他带着姜总队长和一个理发师(华工)到营里来。姜总队长身材高大,大家都听说他精通中国和外国的拳术。他用很流利的洋泾浜英国话与李营长边走边谈,走近“先生”的帐篷时,他才改用中国话大声说,带着辫子到外国来,是丢中国人的脸,叫“先生”立即剪掉。理发师拿着剪子走拢去,但是“先生”怒目而视,不敢动手。姜总队长逼近一步,“先生”一侧身,用二指在他背上一点,姜就站不住脚,向前晃了四、五步。姜掉转身来暴怒地说“你竟敢动手”,眼即抓着“先生”的辫子。“先生”只用二指一捏,那只紧握辫子的右手立刻五指分散了。“先生”再用左手一推,姜即晃到营长面前,幸而营长把他扶住,没有跌下去。围观的中英工头都哄堂大笑,营长也

笑了。姜脸红筋胀，踱到人群后面去了。“先生”才指着姜总队长说：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我丢了中国人什么脸？”他又转过头来对李营长说：“我在威海卫就说过，我的辫子是不剪的，要剪就送我回去。现在我还是愿意回去的。”我把“先生”的话翻完后，李营长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拖着辫子也没多大关系。”从此之后，“先生”更为全营华工所敬重，在后来的多次斗争中，他起了很好的团结本营工人的作用。

第三天午后，“先生”同我下象棋时，突然问我说：“你说长毛贼那些人好不好？”我说：“你一定赞成他们，他们都是留着头发不剪的。”“先生”又说：“有人说，长毛贼留的是满头，不是辫子，对不对？”我说：“他们是汉人，汉人从来就留满头，清军入关才强迫汉人剪成辫子的。洪秀全要保存汉人的真像，当然留满头；你是满人，当然留辫子。”“先生”眯着一只眼睛说：“你还以为我是一个满洲人？”

第四天下午，李营长问我那条辫子为什么剪了？我把实情告诉他后，他又说：“听说这一营的工人都很听他的话，是真的么？”我知道他在打“先生”的主意，所以答复他说：“他不大说话，工人也很少同他说话。”李营长又说：“叫他当工头，一定管得着工人。”我说他的脾气很古怪，不见得愿意干。第五天上午不知“先生”从哪里听见了这个话，他故意当着冉大队长用威胁的口吻说：“哪个要拿我去讨好，他是自找苦吃。”

三

队编好后，我们被排为第十三营。在骆耶尔一共住了八天，就整队上火车，到法国东北边上的阿拉斯(Arrass)去挖战壕。原有三十多万人的阿拉斯城，经过三年多的战火，已全是败瓦颓垣。间或看见几个妇孺，也是蓬头垢面，住在颓垣下面的地窖中，以求乞或卖淫为生。我们就在这些颓垣里搭帐篷，利用颓垣下面的空隙作地下室。遇着空袭或敌人的炮轰，就钻进地下室。我们到后，安好帐

篷就吃晚饭。晚餐是每人半磅面包和一洋铁盒子的洋山芋。洋山芋是夹着洋葱和牛肉烧的；饭量大的人可以增添一次，所以都能吃饱。吃完就去睡。睡六小时后，听见哨子响，赶即起床，又照样吃一顿，即奉令打好背包（两条军毯、一块胶布、一条褥子、一件雨衣、两件衬衫和一套卫生裤褂），去领口粮。背包之外，挂有水瓶、胶鞋、洋铁饭盒（内装洋铁匙子），腋下另挂口粮袋一个。领的口粮是供三天三夜之用的，计有压紧的饼干三十六块，牛肉罐头三个，纸烟三包（十支装），洋火一盒；翻译多三小块黄油。

挖战壕的地方已在敌人步枪射程之内，有些地方，与敌方战壕的距离不过五十码。我们是站在战壕内挖战壕，把挖出的沙土扔到前面，人身都在壕内。挖好六英尺深，三英尺宽，英兵才进来，所以我们实际是在最前线。这与在威海卫时所订合同中“不作战”的话，是不相符的。遇到下雪时，满脸飘着雪花，遇到天晴雪化，壕内泥浆没胫，轮班睡觉时也得站着睡，其苦更甚。英兵只在挖好的战壕中守护阵地。军官和机关枪手，更在后面盖好顶棚的战壕中守着，随时可坐可卧，有些还能玩扑克，讲笑话，与华工相比，苦乐悬殊。

我们第十三营的华工，这样出去三天，退休三天，劳苦了四十多天之后，到圣诞前夕，遭受到更大的痛苦。我们初上前线时，英国人宣传说，他们新发明的坦克车很厉害，德国人却没有，不久之后，坦克车多了，就要大规模地进攻。那知就在圣诞前夕，大家正在谈论圣诞节的礼物怎么还没来时，敌人的大炮声和坦克的轰隆声，震天地响了。有人伸头望去，在月光下面已能看出，一长串的敌人的坦克车正在爬向我们。我们到后面去找英国军官，通通不见了；回转来时，监工的英兵也都不见了。这时有人一喊：“退回哩坡特耳（Le Portel，这是我们来时经过的分区司令部所在地）”，大家才仓皇地后退。起初在战壕中弯弯曲曲地跑，后来又在坎坷不平的地面上跑，一气跑完三十几里，到达目的地时，我们的三个军官都已找好住处，正在找勤务员给他们安床。我们气极了，同到司令部告状，司令部问明我们是十三营后，叫我们先到指定的一个空商店里去

安床铺吃饭,把伤号送到医院去,再写报告交自己的营长转呈。我们当晚把报告写好,大队长冉振海不签名,也不理他,由其余三十五个工头(有四个工头受伤)签名后,面交李营长。一连两天没有回信。这两天吃得较好,还可随便走动,工人的气也消了些。第三天叫我们到卡勒(Calais)去转运粮食和军需。我们知道后方比前线好得多,不等回信就上火车去了。

卡勒是一个庞大的转运站,要把轮船上运来的给养和各种军需品卸入仓库,堆上很高的垛子;再逐日把各战区需要的物品,照上面发下的清单,从许多仓库的高垛子上搬下装进火车运到前方去。那里共有三个华工大营。我们住的那个大营,早已住有四营华工,加上我们就是五营了。各营之间,也像在骆耶耳的一样,用八英尺高的铁丝网隔开,门口有英兵把守,不准华工随便出入。每个铁丝网内,有十四栋长方形的木房,每房能安五十人的地铺。地板之下就是防空壕。木房前面有个操场,供排队和打篮球之用。除三个军官住在附近的特区外,全营都在一个圈里,厨房和厕所也都在内,所以大家都认为比前线好多了。但从次日起,烦恼的事情,就接二连三地发生。

第二天一早,一个英国工头从厕所中拉出一个华工,要罚他立正五分钟,说那是英国人的厕所,中国人不该去。这就引起全体华工的愤怒。英国工头都围起来替他们的入助威,大队长冉振海也帮助英国工头,说各营华工都遵守那个定章。在大队长提到所谓定章时,新出现的英国军官的威风立即高涨,说:“以后一切要守规则,违反者,轻则罚站,重则罚禁闭,罚劳役,受罚两次不改,就要送到英雄队去。”我们谁都没见过英雄队,合同中也无这样的规定。但大队长冉振海却活神活现地说:他在骆耶耳见过,说队里的英雄,谁也不敢乱说乱动,说每天工作十六小时,吃的都是冷的,一不听话就用皮鞭打,用开水淋身,用铁丝刷子刷皮等等。

午后到粮站去装车。大家都还不懂怎样做法。中国工头与英国工头之间话也不通,两个翻译又应接不及,而英国工头同粮站上

的英国人却又乱骂起来了。中国工头责备英国工头说：“你们应该先学会再来教给我们看，那有不教不看就会做好的事？你们说的办法不符合站上的要求。站上吵起来，你们怎么又不负责？”粮站的英国人这才看清事情的真相，对中国工头具体地讲明作法，才解决了纷乱的状态。但时间已耽误了很多，五点钟下班时，只装好四车，还差四车。因为每营半天该装八车，每天该装十六车。工人毫不含糊地说：“今晚再干，合情合理的工作，我们决不推辞。”

当晚，干了一个多小时就装满了四车。以后也是半天四小时的工作，三个小时就作完。但英国人既不许我们提早散工，也不承认工间休息，意图胁迫我们加工。这种额外加工，不但我们不承认，同一大营的其余四营的华工也不承认。因此我们就“慢慢来”了，或者自由休息。有一天，营长带着冉振海到工地来，到处骂人，说工作慢啦，说工作方法笨啦，说这人那人为什么闲游啦。冉振海也帮着骂，还帮着清查“怠工”的人。后来他们又骂抬钢轨的工人为什么走得那么慢，还在钢轨的中间用双手死力向前推。不料两头抬钢轨的工人同时一撒手，压得他们脸红筋胀，才垂头丧气而去。

当天晚上，从阿拉斯退却时受伤较轻的十二人回来了。他们说，还有两个受重伤的人不知何日才能回来；说医生给他们取破弹片时不用麻药，把他们捆在手术床上开刀，弄得他们叫娘叫爷地痛苦万分。全营工人都气愤极了。“先生”却劝大家：“闹尽管闹，没有计划好，万勿动手，英国人显然想打我们一个下马威。”

次晨排队分派工作时，有几个人同时高声喊：“吃不饱，做不动，要减少工作。”接着大家都同样喊。我翻译成英语后，李营长答复说：“英国食品营养好，肚子没装满也不致缺乏营养，而且英国工头也是一样吃法。”大家答复说：“我们也做英国工头那样的轻微劳动行不行？”同时就嘈喳起来。李营长见情况不好，就改口说：“莫乱，好好上工去，我去同司令部商量再说。”

工人中午回营时，见铁丝网外面排列着许多荷枪实弹的英国兵；进营房后，又见昨天才从医院回来的一个工人，被冉大队长打

得周身青紫，说他造谣生事。于是一声喊“大家打”，冉振海立即被拖到操场中，起初是拳打脚踢，后来则用他打人的那条棍子，向他周身乱抽，大家轮流打，同时也数他的罪状，直到他磕头求饶，甘愿永不再犯，才有人劝说：“住手，去吃午饭。”打的时候，英国人都躲开了，不敢露面。大家吃饭时，才有几个英国工头出来，不声不响地把他和先被他打伤的那个工人，一同送到医院去。饭后，工人有些在洗衣，有些在下棋，有些整理房间，有些拉胡琴，一点没有上工的表现。这时上工钟点早已过去，但没人吹哨子（平时是冉振海吹的），也没有人敢问。两点半左右，营长叫勤务员找我去，先问了骚乱的原因（显然是明知故问，冉大队长业已承认打人是他叫的），然后问工人预备怎么办。我告诉他我听见很多人说：“不撤兵、不加口粮，不上工。”营长用可怜的语调说：“这些事不是我能作主的呀！”

4点钟左右，营长又派那个勤务员请我去说，“一个乱子过去了，第二个乱子又来喽，怎么办呀？”他又说：“前线出了大问题，每营必须连夜赶装六十二辆车皮的给养去，本营连今天下午耽误的八车，共该装七十辆车出去呀。”我问他，别营怎么办？他说：“附近四营都闹起来了，今天下午都没上工。看来，他们是受本营的影响，本营不解决，别营也解决不了！”我说：“工人都是讲情讲理的，只要合情合理，事情没有什么难办，错是错在大队长不该打人。”营长忽然提起精神说：“你这个话有把握吗？”我说，“我是中国人嘛。中国人把情理二字看得非常重，不讲情理就会拼命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。”营长说：“好，好，我就到司令部去。”

不到半点钟，铁丝网外面的英兵撤走了，营长也接着就回来，在门口就招手叫我进去说：“口粮没有问题，要紧是今晚装出七十辆车的给养去。你立刻就去对工人说，我派一个人与你同去。”我说：“这不好。你不相信我，叫工人站队，你直接同大家说好喽。”他说：“到底带头人是谁呀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带头人，是大家的公愤。”他说：“冉大队长打的那个人，不是带头人吗？”我说：“绝对不是。他被打到半死后，并没说什么嘛。”

我一进工头房，大家也都围拢来。听我说完后，“先生”首先说：“该收帆了，我们也该显一手给他们看看。”另一人说：“我们那五条可以提啰。”又有人说：“他们正在找带头人，莫露头，叫他先对大家说。我们一唱百和，大家提。站队莫分排分连，提条件的人站在中间或后面。”

我回报后，李营长还有点怕又闹乱子。我又说：“工人肯定是讲情讲理的。”他才叫英国大队长吹哨子。这次他对大家说话非常客气了。他说：“英兵已经撤了，加口粮也不成问题，要紧的是赶快装出七十辆车皮。”并且说：“司令部怕大家太辛苦，预备派一百个英国兵来帮忙。”有个工人大声喊：“口粮要吃得饱，加夜工要加餐。”跟即大家一齐附和。我翻译后，营长连声说：“是、是。”又有人喊：“工作方法我们自己定，车子装齐就收工”，营长答复说：“你们能够自己作得好，那就更好嘛。”第三个条件是门卫由工人自己管。第四个条件是华工交朋友不得干涉。第五个条件是非经宣布罪状不得调走本营中国人。临时又加上一条：叫派来帮助装车的英国人分开工作，我们要同他们比赛。这些条件李营长完全应承，只说只要等司令部批准。话谈完后，华工自动散去催饭吃。英国大队长未敢干涉。李营长热情地同我拉手，我才发现他满头大汗——虽然操场之外遍地都是雪。

当晚6点1刻开工，大家不但做得很迅速，很有条理，而且创造了些新办法。如垛子上的大包，不用人背下来，而用木板滑下来；把车皮先移近一个货堆，装齐之后再移近另一货堆去；除三个“三道”作联系工作外，其余工头都与工人一样背东西。一些英国工头，起初说我们弄糟了，工人叫他们莫管，站开些，我们自有办法。后来他们也都说中国人真聪明。10点来钟又吃一餐，英国工头无事可作，自告奋勇，替我们回营去抬饭。到次晨6点钟，天还没亮（法国冬天7点后才天亮，夏天却是4点钟就天亮），我们装齐六十四车，一百个英兵也装好六车，完成了任务。

回营吃早饭时，李营长领着我到每个房间去宣布说：“你们做

得好，你们所提的五个条件，司令部完全批准了；如果你们今天下半天能和昨天一样装十六车，今天上午你们可以安心睡觉。”但除少数几人外，大家都没睡——有些人在欢谈，有些人买了酒来喝，有些人伴着胡琴唱。“先生”却先要了两杯酒和饭菜给那两个打伤的人，然后又陪他两人到医院去换药。回来时对大家说，其余四营昨天下午都闹了，都没上工；昨夜也是装七十车，至今（九点来钟）还没装齐。

当天下午上工时，李营长又约我同到粮站去。他对各连华工逐一表扬了一番，说他们劳动量重，应该多吃；说他们工作方法好，要把经验推广出去，还说由于他们昨晚的辛苦，提早完成了重大任务，他也受到嘉奖；他衷心地感谢大家。他又到仓库内，问管仓的英国人：“中国工人做得怎样？”那位管仓员说，“昨晚做得还好”（Fairly good）。李笛亚迪营长立地申斥他说：“为什么说还好！我的中国工人，作得比谁都好。他们昨夜的工作效率，比英兵要高出一倍，你没有算过账吗？”

英国人对华工的态度，从此大变，邻营的华工也称赞我们闹得好；但我们始终警惕着没把我们的领头人（先生）暴露出来。

四

其后两年间，华工过得比较顺适了。有几件事情，也值得回忆。

在阿拉斯溃退时，我们因恨英国军官不通知华工径自先跑，而递上的呈文，在闹伙食的时候就已批回来了，李营长怕再火上加油，未敢宣布。过了几天事平之后，才问我怎么办，因要改变本营的番号，不能久压。原来批示上说，那件事情是由于十三营那个番号不吉利，已决定把十三营改为六十四营。我同大家商量后，大家议定，只要李营长以后切实遵守议定的五项条件，过去的事可以不谈，番号立即可以改。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战区的决定，不易改变，而且换一个营长同我们不会有好处。就是已经归服了我们的冉振海，